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作者：唐宝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

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起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①[《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匡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而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与他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又及时起到了引导运动的作用。最后，又是他收获五四运动的成果，组织共产党，把五四运动引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论述，把五四运动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就是说，我们平时所指的五四运动的，专指1919年的爱国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爱国运动、及其意义，甚至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今后中国现代化的彻底实现。

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广义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毫无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是运用来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观点，更不愿意看到五四运动与中共的，有些人对新文化运动有偏见，“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①[周予同：《过去的五四》对此评论说：“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或其他活动分开来做专题研究，自然可以；但这决不是或主流。”②[《五四运动史》（上册），第3页，明报出版部，1981.]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关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由于过去的研究者带有太多的党派色彩，争论很大，如：匡是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③[《总理鉴临下的“五四”运动》，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13页，时的陈诚等人则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④[陈“五四”纪念而作》，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2~3页。]而大陆方面的学者，则多数认为是“引导了五四运动。这些说法都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

二、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是由陈独秀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1840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受尽了屈辱和苦难到1914年，中国人民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康梁维新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彷徨和苦闷。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是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的科学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有历史发展的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等气，形成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当时的孙中山、陈独秀及毛泽东，都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学术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无声无息的。”动》，《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在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大量报刊后，对此建思想虽有冲击，但“严格地说仍未算达到全盘地反省和检讨传统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会上更一种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从1903年开始“才真正出现”。而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流”，第119、123页，三联书店，1997。]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在论述这个观点时，他对陈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反传统文化革命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陈独秀在他参加的1903年拒俄运动中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一份报纸《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

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②[三爱：《亡国的原因》，《安徽俗话报》，第17期。]这就说下，是没有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的。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以“三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利益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

由于这样的内容,《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直接进行政治革命。在这年秋天《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后,才《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成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在当时国民中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一般国民仍如鲁迅小说《药》中吃人化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数如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留学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样,只知道在革命中大的影响,因此,如后来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与结果,定位在一“单调的排满”,即种少数军人政客而不是广大民众。这也是辛亥革命不彻底、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辟也跟踪而来。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

在这股复辟潮流的影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更加严厉地窒息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苦的折磨,生活悲观,甚至自杀,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质。国民连自身的生存权利都没有起而救亡的觉悟。

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皆迷时,陈独秀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彷徨后,清醒而顺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创刊,陈独秀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声言要彻底改造国民性“新青年”。这种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和无比锐利的战斗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佛教的迷信、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其中振动最大的是伦理革命、宗孝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权利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

这次运动与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和国家的基石)的关系,即从“个人”的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陈独秀指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的觉悟具有更深的层次:“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②[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这就把人的解救亡统一起来了。

新文化运动经过几年的斗争,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在青年一代中,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突破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束缚,团结到《新青年》周围来,先是为个人的“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路。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创办类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必然走上政治斗争之路,启蒙向救亡转化,从而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呢?新文化运动政”的,即“20年不谈政治”。但此约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如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等关系到卖国、亡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就不能不谈。陈独秀在回答当时责问《新青“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①[《答顾克刚》,《新青年》,第3卷,第5号。]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②[《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

三、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

北京和全国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状况显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足的组织条件层次:(一)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除了上述陈独秀是“总司令”之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一个重要的由”为办校方针,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顾茅庐之诚,把当时没有学位、没有教授职称的陈独秀从上海聘重任,并允许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办理。同时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学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陈起新文化运动的司令员,终使在上海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壮大扩展到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定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即便有,也不会有那样的景秀、胡适那样的鲜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和陈、胡、钱等人受到保守势力攻击时,尽了保护新文化运动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纾一封回信,竭力为新文化运动辩护,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污蔑和攻击

特别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情操对五四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

对于学生,虽然他认为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政治集团和学校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他不像胡适治有兴趣的学生,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任何政治集团;学校可以对他们加以劝告,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自由团。虽然这些社团开始是带有学术、娱乐和服务性质的(如学生会、新潮社等),但一旦组织起来,在政织或带上政治色彩。

从当时三位亲历者何思源、叶景莘、许德珩回忆1919年5月2日和5月3日蔡元培亲自推动运动的情况①《北京文史资料》,第4辑,第67页;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

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来看,说蔡元培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中流砥柱又为营救被捕的学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说,蔡元培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胡适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界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不过,说起其他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并不符合实际。因为,无论从新文化运动,还是从爱国运动方面,李大钊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都比胡适大。李想上一致的最亲密战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引进《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中,由于陈独秀早在3月已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大,胡适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动,也不在北京。只有李

胡适在上海接到陈独秀等人的信了解北京学生游行事件后,颇不以为然。他一贯主张学生应该专心“读国”,主张进行新文化运动,改造落后的国民性,进行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运动;而政治救亡工作应在运动高潮时,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无深刻性。“教育救国”,本来也是新文化运动这种主张会得到相当的响应。这是运动后期一部分学生运动领袖跟随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运动前曾,所以胡适可以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二)群众基础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前,新文化阵营的其他干将还有十余人,他们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如6月9日与陈独秀一起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参见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三)群众基础之二——

五四前,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外,还有不少人参加新文化运动,同情、支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年轻者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教育、启发和代英、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

(四)群众基础之三——《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读者群和直接与陈独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爱

这个人数有多少?难以正确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单以1919年5月前《新青年》上刊的极少一部分),其中陈独秀亲自公开答复的读者就有32人之多。就《新青年》论,1917年以后,“五四一人读一份,就是1.6万人。而像北大、长沙第一师范等校,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册万,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就此而论,说《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为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是不为过的吧!自然,阅读和写信给陈独秀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拥护陈独秀主张和新文化运动的,但是轨迹,甚至组织社团,进行活动的青年,也不是少数。

毛泽东曾回忆:“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①[转引自:《每周评论》创刊后,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团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发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多适选集》,第1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五)群众基础之四——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领袖。

鉴于五四运动是以北大和北京学生为先锋首先发起的,所以,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运动,还亲手培养了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

五四运动的爆发,以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和五四游行为标志。这两个事件的组织者是国民社和新潮社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学生运动领袖都是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亲自教诲的学生。他们的经历和回忆③, [秀评论选编》(下);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罗家伦:《逝者7.]表明他们与陈独秀的关系十分深切。特别是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是受到陈的。

段锡朋以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6月5日,他与许德珩等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会议虽罢”,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6月21日,已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终于取得胜利。可以说在整个袖。

五四当天游行的总指挥是傅斯年,起草游行中散发的最重要的白话文传单的是罗家伦,谒见美国公使家伦、段锡朋。

这里,顺便对过去在大陆上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提出异议。这种说法认为: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此而把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这些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排除在外。①[华岗:《五四运动运动在北京》,第170页,北京出版社,1979。]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有为第一,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并非都是《甚至主要不是)后来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北京是如此,立的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成员名单中,就可清楚地看出。

第二,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因为当时他们“赞成任当时“新潮社”的领导人傅斯年和罗家伦比谁都激进,甚至比他们的老师陈独秀、李大钊还要激进。这可大量文章来证明。所以,若以“赞成俄国革命”此一标准来衡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矛盾的。

总之,谁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只能有一个标准,即看其在当时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从思想倾向上述文章中也承认,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分化:“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份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86。]还需

总司令”的陈独秀直到1920年初才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所以，如果硬要在思想上给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和爱国主义者。

（六）群众基础之五——当时同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进步党和国民党人。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得相当活跃，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因此，两党分别从1918年春天和五四运动后期起，他们的呼应，宣传新思想，甚至传播马克思主义。

四、对五四运动的指导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救亡运动准备着以上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的时候，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掠夺去的我国山东权利是否能归还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陈独秀、李大钊等年《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于12月22日，创办了一份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干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指导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接过当时人们的口头禅“公理战胜强权”，提出了两大主义：“第一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接着，12月29日，陈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①[《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关于国内的斗争，陈又提出更具体的目标，即“除三害”——军人、官僚、政客。形式：“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和“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②[《除三害》，《和会表现出由“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将“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的态势时，陈又在《每周评论》上立露，而在3、4月份，当日本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国山东权利的野心时，《每周评论》立协定以来的种种侵略中国权利的罪恶和北洋政府为满足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当——这里，实际上地举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帜。

5月4日前夕，当得知五四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针对敌我友各方的动向，更及时发出鲜明而强烈的政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一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每周评论》，第21号。] 5月18日，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省的问题的错误认识，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敬告中国国民》应该全民起来奋斗。②[《为山东问题敬告各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提出理！平民征服政府！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又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辱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④[《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从此，“出了室”，就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座右铭。毛泽东在指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

特别是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竟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亲自起草了内容，印成中又亲自到闹市区去散发，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五条“最低要“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表现了反日的彻底性；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位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捭王怀庆的官职，并“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这就把一般的政治运动，导向革命的道路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及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们——蔡元培、李大钊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入的战斗纲领、口号动的干将们还身先士卒，冲到了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陈为此还被捕，由于各界的营救，三个月后才获

所有这些，雄辩地证明了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据朱务善等1!是青年学生）心目中大人物是哪几位？结果以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票数最多。①[《本校二十五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这也有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法，是多么站不住脚。

五、关于五四运动的结果

五四运动的结果：由启蒙转向救亡，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这是